



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Literary
Evolution in Han Dynasty

许志刚 杨 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国家社科基金
后期资助项目

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d Literary
Evolution in Han Dynasty



许志刚 杨 允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许志刚,杨允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1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ISBN 978 - 7 - 301 - 26721 - 9

I. ①汉… II. ①许… ②杨…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汉代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00338 号

- 书 名** 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
HANDAI WENHUA ZHUANXING YU WENXUE LIUBIAN
- 著作责任者** 许志刚 杨 允 著
- 责任编辑** 徐 迈
-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301 - 26721 - 9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6467
- 印 刷 者**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730 毫米×1020 毫米 16 开本 19.5 印张 338 千字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48.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信箱: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电话:010-62756370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汉初多元文化与诸侯王文学	(24)
第一节 汉初文学的秦文化语境	(25)
第二节 黄老道家与汉初文学	(39)
第三节 诸侯王文化与文学	(56)
第四节 贾谊的思想与文学创作	(77)
第二章 汉代文化建构与辉煌的大汉文学	(90)
第一节 儒家与黄老争胜:文化转型中的思想激荡	(91)
第二节 汉家典法与文化建构	(99)
第三节 大汉盛世情怀与文学精神	(109)
第四节 董仲舒《春秋》学的现实关怀	(125)
第五节 旷世辞宗司马相如	(133)
第六节 千古良史 不朽文豪:司马迁与《史记》	(147)
第三章 广建文物声名与发展文学形态	(184)
第一节 称制临决经义与主流学术调整	(185)
第二节 汉代中期文学的多元发展	(202)
第三节 渊默深思 清静自处:扬雄的思想与文学	(226)
第四节 博学精思 述古鉴今:刘向的文学成就	(233)
第五节 班固的文学成就	(239)
第四章 汉家文化重构与文学走向	(254)
第一节 主流文化的裂变与重构	(254)
第二节 文学思想的二重建构	(263)

2 汉代文化转型与文学流变

第三节 岩穴幽隐与士人精神家园	(275)
-----------------------	-------

第四节 文网禁锢与激昂文学	(289)
---------------------	-------

参考文献	(303)
------------	-------

后记	(307)
----------	-------

绪 论

汉代文化是既不同于周文化,又区别于秦文化的文化体系,它给予此后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古代文化以根深蒂固的影响。汉代文学就是在这一语境下生存、发展的。汉代文化的转型构成了汉代文学流变的外部动力,制衡了汉代文学的发展态势。

一、汉代文化转型与汉代文学分期

在长达四百年的汉代历史中,汉家文化处于不断的发展中,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调整,成为汉家文化建构、转型的基本内容,也显示出文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文化的形态制约着文学主体的精神、性格及审美取向,成为文学流变的外部驱动力。汉代文化、文人性格情感、汉代文学三者紧密关联。汉代的审美取向、文人性格的时代性差异和一个时代文学的整体风貌,都可以从汉代文化建构与转型的不同层面得到阐释。

汉代文化的转型与汉代文学分期有着连动性特征,汉代文化的转型催生出汉代文学流变的阶段性。纵观汉代文学与文化发展,可以明显划分为四个阶段,即发展期、鼎盛期、整合期、震荡期。这四个阶段的文学也表现出审美取向、文学精神和文学风貌的差异。

(一) 汉代文化发展期的文学

汉代文化发展期包括高祖至景帝在位的六十余年。汉王朝刚刚建立之时,经陆贾等人批评、诱导,对秦王朝因暴力统治导致灭亡的教训引以为戒,废除以“挟书令”为标志的毁灭文化、残害人民的法令。同时,以曹参为代表的决策者自觉地探索主流文化建设,确立了黄老学说在汉初政治思想中的主导地位。主流文化以“无为而治”的平和态度对待各种文化,为社会的发展、个人才能的发挥提供宽松环境。不同体系的文化在汉初政治、经济乃至精神生活中异彩纷呈。

《汉书·文帝纪》赞曰:“孝文皇帝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人十家之产也。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身衣弋绋,所幸慎夫人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瓦器,不得以

金、银、铜、锡为饰,因其山,不起坟。”^①文帝不扩建宫廷,陵墓建设务求节俭,他还要求最宠爱的夫人穿衣朴素,都表现出上层统治阶级以敦朴为主调的审美取向。

有人向文帝进献千里马,文帝诏曰:“鸾旗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文帝退还千里马,并给献马者运送的补偿。其实,千里马不过是奢华的符号,它的价值在于突显主人的权势、尊贵与奢华,而不在于拥有者真的骑着它日行千里。文帝就此事又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不仅千里马,还包括其他足以炫耀权势的奢华之物,文帝一概拒绝接受。于是,“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②,在赏心悦目的娱乐、爱好等方面,也都体现出统治者崇尚敦朴之美的基调。这一审美取向的文化基因出自道家以素朴为美、以自然为美的思想主张。

崇尚敦朴的思想倾向不仅体现在文帝的言行中,还体现在窦皇后对皇室后代及外戚的约束中。窦皇后毕生都坚定地信奉黄老学说,不论她为皇后时期,还是皇太后、太皇太后时期,都努力践行、维护这一思想学说。她要求王室子弟和窦氏子弟都学习《黄帝》《老子》等道家经典,并且要奉行黄老思想^③,这是汉初以主流文化教育、约束后人的典型范例。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大量简帛文书中,既有《老子》及佚书、《周易》及佚书,还有定名为《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等佚书。这些出土文献表明诸侯王与中央王朝的文化建设是同构的,体现出以黄老思想为基础的主流文化在汉初传播范围之广。

汉代统治者借助黄老之学创建宽松的政治氛围,同时移植秦文化,建构汉初文化的基础。虽然汉初士人的学术修养和思想观点存在较大差异,却都能找到适当的机会而有所作为,刑名之学如晁错,儒学如伏生,纵横之术如蒯通,黄老思想如张良,他们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不同的作用。各种学说都在黄老道家“无为而治”的环境中生存发展。

发展期的汉初文坛以敦朴之美为基调,文人的审美取向和艺术修养趣舍万殊,文学创作各呈异彩。不仅文人之间存在明显的思想差异,甚至有些杰出文人自身的知识结构也体现多元性特征,如贾谊、枚乘等优秀作家都在归本黄老的前提下,博采各家学派之长,以至于他们的作品表现出丰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旨趣。

① [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34页。

② 同上书,第2832页。

③ [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1975页。

（二）汉代文化鼎盛期的文学

汉王朝文化鼎盛期主要为武帝统治的五十余年。这一时期,汉王朝国力强盛,北方平息匈奴的侵扰,南方安抚百越的争斗。统治阶层积极推进文化建设,建立以独尊儒术为标志的主流思想与官方学术,以封禅为标志的礼乐制度,以《太初历》为标志的历数、服色制度。这一时期的文坛充满活力,昂扬的气势和巨丽的风格成为时代的主调。贤能俊杰奋发向上,各展才华,共同创建辉煌的盛世文化和盛世文学。

《汉书·武帝纪》比较了发展期同鼎盛期文化与文学的差异:“汉承百王之弊,高祖拨乱反正,文、景务在养民,至于稽古礼文之事,犹多阙焉。孝武初立,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遂畴咨海内,举其俊茂,与之立功。兴太学,修郊祀,改正朔,定历数,协音律,作诗乐,建封禅,礼百神,绍周后,号令文章,焕焉可述。”^①

文帝时,贾谊、公孙臣等上书,建议朝廷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建立汉王朝自己的文化体系。文帝认为各方面准备都很不够,未予采纳^②。武帝却以刻不容缓的态度推进文化建构,如饥似渴地征召贤良之士,帮助他实现盛世宏图伟业。《汉书·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载,主父偃、徐乐、严安几乎同时上书谈论世务,武帝召见三人,感慨地说:“公皆安在?何相见之晚也!”然后拜三人为郎中^③。武帝的感慨表现出他建设盛世文化的紧迫感和对贤能人才的渴求。

武帝即位,便在大臣的辅助下改变汉初以黄老道家为主导的文化格局,扶植儒家思想学说在主流文化领域的地位。《史记·儒林列传》云:“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④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尊崇儒家思想,改变汉初仅立《诗经》博士的做法,设置五经博士,兴办太学,明确要求各地推荐人才必须以儒家学术为根基。

武帝即位之初,赵绾提出举贤良要考量儒学修养,要避免“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⑤者入选。然而,这只是当时对贤良的普遍要求。武帝最亲幸的大臣都不是纯儒。

公孙弘是武帝最器重的大臣,以举贤良入朝,数年间拜相、封侯。公孙弘

① [汉]班固:《汉书》,第212页。

② [汉]司马迁:《史记》,第2492、1381页。

③ [汉]班固:《汉书》,第2802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第3118页。

⑤ [汉]班固:《汉书》,第156页。

年四十余才学《春秋》杂说,武帝“察其行慎厚,辩论有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上说(悦)之”^①。公孙弘在官吏任职方面很内行,又能将自己的言行装点上儒学的文采。公孙弘平步青云并非因儒家思想修养突出,而是他的性格,他在官场的综合能力得到武帝肯定。

主父偃、严助学长短纵横术,又学《春秋》。严助为会稽太守,数年不向朝廷汇报。武帝令其上疏,曰:“具以《春秋》对,毋以苏秦从横。”^②武帝要求严助回答时不能用纵横家说,表明武帝知道他的学养并非完全建立在儒家学说基础上,但这并未影响他成为武帝最信任、最亲近的大臣。

严安在上疏中引用阴阳学大师邹衍的观点,可见他的思想倾向并非完全建立在儒家思想根基上。东方朔谈论问题“不根持论”,即缺少正确的理论依据,他上书陈述农战强国之计,所引用的都是商鞅、韩非等法家的思想观点^③,这表明他对法家思想观点还懂一些,对儒家的思想、观点则很陌生。

上述众人都是武帝最信任的大臣,从武帝对他们的态度可以看出,当时虽强调选拔人才要以儒学为基础,但并不排斥兼有其他学术素养的人才。

封禅是汉代文化建设中的大事,也是汉家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武帝与公卿诸生议封禅典礼,群儒说不清封禅的仪式等事项,武帝便采纳公孙卿等方士的主张^④。可见在文化建设方面,武帝重视儒家思想学说,同时,对其他体系的文化和学说也兼收并蓄。

武帝时期,大力推动主流文化建设,妥善应对非主流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生存与作用。汉代文化建构正是以儒家思想体系为主导思想,辅以刑名、黄老等学说,扬弃秦文化、周文化、楚文化而构成主流鲜明的文化格局。汉代主流文化地位突出,也为非主流文化留有发展的空间,使其在社会生活与政治中发挥活力和作用。

建元三年(前138),闽越举兵围东瓯,东瓯向汉王朝告急,请求救援。在朝廷讨论中,太尉田蚡认为这是越人间互相攻击,不值得朝廷救援,并说秦朝就已放弃他们。严助反驳田蚡,指出秦不关注越人是因国力不足,并不是有意放弃,更特别批评太尉田蚡以秦为榜样的错误:“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⑤严助的论辩表现出对秦王朝的蔑视,洋溢着大汉盛世精神。

① [汉]班固:《汉书》,第2618页。

② 同上书,第2789页。

③ 同上书,第2775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第1397—1398页。

⑤ [汉]班固:《汉书》,第2776页。

枚乘的作品和司马相如的《子虚赋》都产生于景帝时,但景帝不好辞赋。武帝为太子时便喜欢读辞赋作品,仰慕枚乘,即位后以安车蒲轮征召枚乘。枚乘年老体弱,死于途中。这是令武帝遗憾的事。武帝偶读《子虚赋》,非常赞赏,慨叹:“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①这两件事反映出汉代帝王阅读趣味乃至审美取向的差异,固然同景帝、武帝个人的文学修养有关,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两个时代审美取向的变化。

司马相如在武帝面前谈及《子虚赋》曰:“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②这不仅仅涉及文学创作内容的变化,更预示了时代精神的改变。他在《上林赋》中假托亡是公之口说:“且夫齐、楚之事又焉足道邪!君未睹夫巨丽也,独不闻天子之上林乎?”^③诸侯之声势,与天子上林苑的巨丽之美,被视为时代精神和审美取向转变的标志。

汉初以黄老思想为主导的无为而治的政治态度和以敦朴为核心的审美取向,已经无法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西京杂记》载司马相如的创作状态和体会,是要“控引天地,错综古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这样的“赋家之心”,乃是创造盛世杰作的动力之源。《西京杂记》又云:“司马长卿赋,时人皆称典而丽,虽诗人之作不能加也。扬子云曰:‘长卿赋不从人间来,神化所主耳!’”^④《汉书·艺文志》也以“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概括司马相如等人辞赋的特征。

这里说的侈丽闳衍、丽以则、丽以淫、典而丽,核心都围绕一个“丽”字。这些论述正道出了以司马相如为代表的汉赋艺术的基本特点,即巨丽、侈丽。这是当时主流文学艺术精神的凝结,也是文学创作与时代审美的结晶。

这个时期涌现出司马相如、司马迁两个伟大的作家以及庞大的文人群体。他们的思想、个性和艺术修养存在明显的差异,但他们都是这一时代的精英,都在文化与文学中表现出极大的创造性。他们的审美追求、文学精神,他们在文学范式、文体样式、艺术风格等方面的成就,都表现出时代特色。

(三) 汉代文化整合期的文学

汉代文化整合期是指从昭帝至东汉中期,时间跨度较大,而以宣帝、章帝统治时期为代表。这一阶段文化建设的突出特点是主流文化的强化和主流文化内部的修饰,以周代礼乐文明修补、完善汉家典法,同时,排斥非主流文化,导致汉家文化从多元和谐走向单一闭锁。这一时期突出的文化工程是宣

① [汉]司马迁:《史记》,第3002页。

② 同上书,第3002页。

③ 同上书,第3016页。

④ [宋]李昉等编:《太平御览》,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45页。

帝主持石渠阁论议、章帝主持白虎殿论议,都是强化儒家思想的主流地位,调整以《春秋》学为代表的官方学术内部结构,调整儒家学说内部结构的重要举措。

武帝时,董仲舒、公孙弘都以《春秋》公羊学显赫一时。公羊学以微言大义的方式解释经典,亲和政治,受到武帝特殊重视,公羊学成为主流文化的学术核心。公孙弘平步青云,拜相封侯;董仲舒时献高论,成为当时的思想领袖。武帝推崇公羊学,超拔这一学派出身的士人,诏令太子学习《公羊春秋》。公羊学大行于世。

宣帝即位,听说自己祖父卫太子受诏学习《公羊春秋》,但又违背武帝意旨,私下学习《穀梁春秋》,他于是也倾向于《穀梁》学。宣帝的学术意趣得到丞相韦贤及其他大臣的支持,遂从郎大夫中选拔一些人学习《穀梁春秋》,培植这一学派的力量。经十余年的积累,以穀梁学为根基的士人在朝廷已形成队伍。甘露元年(前53),宣帝亲自在石渠阁召集群儒讨论五经异义,裁定对经典的解说,重点比较《公羊春秋》《穀梁春秋》异同。在讨论中,穀梁学优势明显,于是,《穀梁春秋》得到特殊扶持,盛行于世。

章帝效法宣帝“临决五经异义”的做法,亲自主持白虎殿论议,讲议五经同异,与诸儒共同研讨经义,这次会议之后,《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虽不立学官,但都选择名师讲授,并选一批学子做他们的弟子。这表明古文经学已经得到朝廷的扶持,获得了良好的发展契机。

石渠论议和白虎论议是汉王朝强化主流文化建设,掌控官方学术的重要工程。公羊家等今文经学派以微言大义方式阐释经典,为迎合人主又时有曲解经义现象发生,而且章句繁多,碎裂经义的庸俗烦琐学风,常使学子不得要领。这两次学术讨论也较多地表现出对经典文本的回归,表现出对经典所宣扬的周文化的借鉴与整合。这两次天子“临决经义”也造成权力干预学术的极端范例。

这一时期主流文化的整合深刻规约着文人的学养、性格乃至审美取向。扬雄在《法言》中谈到做人,要求将言、行、貌都纳入儒家规范中,“好书而不要诸仲尼,书肆也;好说而不要诸仲尼,说铃也”^①,言论、著述都要符合孔子的思想观点,否则,读书再多也不过是陈列贩卖典籍的书摊店铺而已。他贬低刑名、纵横等学说为邪门歪道。汉代民间谚语说:“遗子黄金满籝,不如一经。”^②这足以表明官方学术强化的程度。这个时代的文人多循规蹈矩的法度之士,多彬彬之儒,言必称儒家经典,文人的个性表现出理性特征,文学也

① 汪荣宝:《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页。

② [汉]班固:《汉书》,第3107页。

显示出内敛深沉的特点。扬雄曾倾心辞赋创作,于成帝时先后献《甘泉赋》等作品,但后来却蔑视辞赋,称之为“童子雕虫篆刻”,是“壮夫不为”的小技艺,他从此转向思想理论著述,默而好深湛之思。刘向广泛采集经传说记中的记载,著为文章,述前人,寓借鉴,寄讽喻,警戒世人。班固在《两都赋》及《汉书》中都表现出对法度之美的认同。

(四) 汉代文化震荡期的文学

汉代文化震荡期指东汉中期至汉末。这一时期,汉家主流文化失去权威,古文经学对讖纬谬说和今文经学的批判表明主流文化的分裂与重构。外戚、宦官对权势、利益的追逐导致政纲废弛,体制破败。

汉代文化震荡突出体现在鸿都门学的设立和“党锢”事件中。灵帝设鸿都门学,以辞赋、书画等技艺用人,授以高官厚禄,为他们画像立赞,与汉代名臣并列。这完全改变了汉王朝以儒家经术选拔人才的传统,所重用的人不能承担治理国家的责任,同时,也阻塞了大批士人进入仕途的门路。另一方面,朝政败坏,官场黑暗,引起士人的普遍不满,士人清议朝政,品评吏治,统治者害怕士人的舆论,便以党锢之名,罗织罪状,残酷迫害士人。朝廷以暴力钳制舆论,党锢不断扩大,殃及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往往一案牵连数百人。

在朝廷忽视主流文化建设之时,思想界却存在着对主流学术执着坚守的力量。贾逵因势利导,为《左传》争立博士做出贡献,马融、郑玄持续努力进行古文经学的研究与传播,特别是郑玄同《公羊》学者何休展开论战,何休拜伏,古文经学胜出。郑玄为“三礼”作注,为毛诗作笺,对周代的典章制度和文艺思想作了充分的阐述,这些学者给走向衰败的汉代主流文化提供了极好的补充。

在这一文化转型期,文坛也在激荡、裂变中向两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发展,文学之士分道扬镳。一些守节之士羞于媚事权贵,对政治感到失望,无意仕进,淡泊名利,向道家思想寻求人生寄托。他们多高蹈隐逸之行,“岩穴”成为一些文人重要的生活去向和精神栖居地。他们歌颂隐逸生活与情趣,开辟文学的新天地。另一种倾向是秉持正义、气节,坚持人格操守,关心社稷民生,欲扶大厦于将倾,拯社稷于危亡,救百姓于苦难,他们视道义为超越个体生命的价值。此时的文学表现出审美取向的转变,生命意识升华,人文精神高张。激切慷慨的风貌,成为这一时期入世文学的鲜明色调。

二、汉代文学范式

汉代文化的建构与转型在较深刻的层面给予文学范式以动力。汉代文化的不同形态环绕着成长中的文人,制衡他们的性格,涵育他们的审美取向,从而使文坛精英以高度的艺术修养创造文学范式。

汉代主流文化要求文学从属于政治。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楚庄王》中论述改制作乐云：“制为应天改之，乐为应人作之，彼之所受命者，必民之所同乐也。是故大改制于初，所以明天命也；更作乐于终，所以见天功也；缘天下之所新乐，而为之文，且以和政，且以兴德。天下未遍合和，王者不虚作乐。乐者，盈于内而动发于外者也，应其治时，制礼作乐以成之。”^①

董仲舒以儒家功利文艺观为基础，结合汉王朝主流文化建构而提出自己的主张。在儒家思想看来，文艺是圣王统治方略的一个方面，是实现其治民心、化民性，达成天下大治的重要手段。《礼记·乐记》云：“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政以一其行，刑以防其奸。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②董仲舒所阐述的正是建立在儒家思想基础上的功利文学观。颂圣德、移人心，是主流文化对文学的期许。实现这样的目标，文学也就失去其审美功能，沦为政治和主流文化的奴仆。

班固《两都赋序》曰：“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礼官，考文章，内设金马、石渠之署，外兴乐府协律之事，以兴废继绝，润色鸿业。”^③这是班固对汉代鼎盛时期学术、文艺的评价。这一评价是否合于汉代文坛历史事实，是否渗透了班固对这一时期文学艺术性质的误读，较少有人分辨。但“润色鸿业”却被很多学人接受，并援引为对汉代文学属性的基本概括。班固《两都赋序》对汉代文学还有进一步的论述：“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闲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也。故孝成之世，论而录之。盖奏御者千有余篇，而后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④这里说的“宣上德”，乃是“润色鸿业”之类，他也肯定了“抒下情”的文学创作。

实际上，汉代文学并非主流文化的奴仆。主流文化规约文学艺术，而文学艺术一方面受到主流文化的影响、制约，另一方面却更多地植根于时代生活、作家的审美取向，植根于作家来自现实生活的感受。

汉代杰出文人将文学视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为之付出极大热情。枚乘在七国反叛前曾两次上书吴王刘濞，谏阻其与朝廷对抗，吴王不听，终于败亡。汉平七国之乱，枚乘因预先警诫吴王而知名。景帝召拜枚乘为弘农都尉。可

① [清]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19—20页。

② [清]朱彬：《礼记训纂》，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第560页。

③ [南朝梁]萧统编，[唐]李善注：《文选》，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21页。

④ [汉]司马迁：《史记》，第2999页。

是,枚乘多年为大国上宾,与英俊相处,切磋文艺,不愿做郡吏。于是托病辞官,回到梁园。梁园宾客都善于创作辞赋,枚乘成就最高。司马相如早期入朝为郎,任景帝的武骑常侍,随从天子狩猎。司马相如好文学,并不喜欢武骑常侍的职务。此时梁孝王来朝,随行的邹阳、枚乘、庄忌夫子等都是著名文士。相如见后非常羡慕,于是托病免职,客游梁。相如与诸文士交游数年,创作了《子虚赋》。在枚乘和司马相如看来,处身宽松的环境中进行文学创作比官场俸禄更合于他们的人生追求。司马迁遭宫刑,身心受到重创,“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所以隐忍苟活,函粪土之中而不辞者,恨私心有所不尽,鄙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辞,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草创未就,适会此祸,惜其不成,是以就极刑而无愠色。仆诚已著此书,藏之名山,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虽万被戮,岂有悔哉!”^①在司马迁的心中,文章著述事业是他人生的最高追求,也是他超越生命、荣辱的精神支柱。

在这样一些杰出作家的共同努力下,汉代文学范式得以确立。汉代文学范式可分为四种类型:

(一) 润色鸿业

班固《两都赋序》中所谓“宣上德而尽忠孝”的文学自然属于这一范式。其实,不仅班固有此论述。司马迁著《史记》,以孔子修《春秋》为自己的榜样,他回答上大夫壶遂时引用先人的话说:“《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他将《春秋》记事分为褒与刺两大类,“采善”“推三代之德,褒周室”,属于颂扬一类。司马迁等杰出作家生活于汉王朝鼎盛时期,文化建设和国家实力的发展,都是作家们亲见亲历。他们充分感受到时代精神,从而将自己的文学创作融入盛世伟业中,称赞、颂扬这些辉煌的功业,肯定圣主、贤臣在这伟业中的贡献,是文人情怀自然的、必然的表现。因此,司马迁说:“且余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贤大夫之业不述,堕先人所言,罪莫大焉。”司马迁、班固将歌颂时代,颂扬王朝真实的功业视为己任,否则便以为失职。因此,“润色鸿业”成为汉代文学的特点之一。

然而,应充分看到,在汉代“润色鸿业”的文学中,也存在一些比较复杂的现象。一些符瑞、讖纬乱象被当作时代伟业,滥入歌咏中。《汉书·礼乐志》载,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乃命乐府,采诗夜诵,

^① [汉]班固:《汉书》,第2733—2736页。

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以合八音之调,作《郊祀歌》十九章。其中《齐房》十三云:

齐房产草,九茎连叶,官童效异,披图案牒。玄气之精,回复此都,蔓蔓日茂,芝成灵华。^①

这是文学侍从于元封二年(前109)见灵芝生于甘泉齐房而作。王充《论衡·佚文》载,永平中,“神雀群集”,明帝诏群臣作赋颂上奏。班固、贾逵、傅毅、杨终、侯讽等人各呈《神雀颂》,五篇作品被称为“文比金玉”。

在这些创作中,圣德的光辉致使文人的个性迷失,他们所歌咏的盛德也经不住历史的检验,颂美中渗入功利性动机。宣帝讲论六艺群书,对文学艺术表现出浓厚兴趣。益州刺史王褒为讨好宣帝,令王褒作《中和》《乐职》《宣布》等诗,又选童子歌唱,赞美宣帝的盛德。王褒作颂,是承命而为,在不知不觉中被纳入王褒阿事主上的活动中。章帝时,傅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明帝去世后,祭祀时赞美明帝的颂歌还未确定,傅毅便仿照《诗经·周颂·清庙》作《显宗颂》十篇,极力夸大赞扬明帝的功德。傅毅因此获得朝廷嘉许^②,这也正是他所追求的。至于所谓“孝明皇帝功德最盛”,显然不合于历史事实。

有些作家在润色鸿业的名目下粉饰现实,虚夸功德,撰写阿谀奉承的作品,不仅虚美天子,甚至阿谀权贵,如扬雄的《剧秦美新》、班固的《窦将军北征颂》等,颇遭后人诟病。

(二) 辩丽可喜、娱悦耳目

汉代文坛还有一些表现闲适逸趣的作品,其作者以枚皋、王褒等最突出。枚皋是武帝最亲幸的文学侍从,“上有所感,辄使赋之”,凡天子弋猎、射驭、狗马、蹴鞠、刻镂等休闲娱乐活动,乃至皇子出生、天子东巡狩,封泰山,塞决河等大事,受命献赋,援笔立成。“又言为赋乃俳”,“其文骯骯,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甚闲靡”^③。枚皋在文学创作中追求幽默、华美,归之于赏心悦目的艺术效果。王褒是宣帝的文学侍从,经常与张子侨随从天子放猎,所幸宫馆,每每献歌献赋,天子品其高下,赏赐锦帛。有的大臣认为这些作品都是些无关宏旨、“淫靡不急”的休闲之作,不应赏赐与提倡。

对辞赋“淫靡不急”的批评,是从功利作用角度苛责文学,要求文学承载

^① [汉]班固:《汉书》,第1065页。

^②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610—2613页。

^③ [汉]班固:《汉书》,第2366—2367页。

政治功用。殊不知统治者在强调功利文学的同时,也需要休闲、娱乐,需要“辩丽可喜”的艺术。武帝、宣帝都喜欢郑、卫歌舞,喜欢枚皋、王褒等人的作品,表现出他们审美情趣的双向需求。宣帝曰:“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①宣帝肯定赏心悦目一类文学艺术存在的合理性,表现出汉代审美取向对这一文学范式的认同。

(三) 抒下情、发愤著书

班固《两都赋序》谈到另一类文学则是“或以抒下情而通讽谕”,是否“通讽谕”姑且不论,但他肯定了“抒下情”在文学中的普遍性与合理性。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指出,前代不朽典籍“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是这些圣贤“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的成果^②。

汉代文人因经历坎坷、不幸,或者因世道不公,而将其愤懑怨怼诉诸文学,将他们的喜怒哀乐表现于文学作品中。贾谊才华出众,受到周勃等权臣妒忌、排挤,被贬长沙。他听说长沙卑湿,多病损寿,自己又被贬谪去,意不自得。心情郁闷,在渡湘水时,作赋以吊屈原。贾谊满腔不平、愤慨,在湘江边、在屈原身上找到共鸣。杨恽与几个亲戚、朋友间的谈话,竟被朝廷定为不敬之罪,“遭遇变故,横被口语,身幽北阙,妻子满狱”^③。后侥幸免死,废为庶人。遭此沉重打击,杨恽愤懑不平,又无法诉说,遂以田家耕作、斗酒自劳的生活寻求解脱,但这又引起朝廷非议,认为他应闭门思过,作可怜状以求朝廷垂怜、宽宥。于是,杨恽在《报孙会宗书》中将自己压抑多年的情感诉诸笔端。

蒙怨含屈、横遭猜忌、无端斥逐、怀才不遇,种种复杂心态、情感,都在汉代文人笔下表现出来,于是,有伤士不遇,有怀古伤今,有思幽、述行,充分展现出汉代文人内心的波澜与不平。这是多数文人创作的主要动因,比“润色鸿业”获取荣名的功利动机,具有更强烈的、更直接的驱动作用。

(四) 忧黍离而叹民生

汉代杰出文人将文学视为不朽的盛事,不戚戚于个人得失,身在江海之中,心存魏阙之下,黍离之忧、民生之叹与个体精神融合。善恶美丑、道义顺逆、庶民疾苦、社稷兴亡,无不萦绕心间。应物兴怀,感物吟志,愍同类而伤不

① [汉]班固:《汉书》,第2829页。

② 同上书,第2735页。

③ 同上书,第2895页。